

“马克思主义+城市经济学”融合创新研究

# 为人民城市建设提供分析框架

■ 夏明月 张学良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聚焦城市空间、资源及增长的城市经济学存在深刻辩证关系，二者融合形成的新范式，为解析城市化异质性与不平等提供了重要学术视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挖掘二者的理论契合点、锚定“人民至上”价值导向、探索实践赋能路径，对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 价值准则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城市经济学的深度融合，为破解城市化进程中的结构性矛盾提供了科学分析框架。二者在城乡关系、空间治理、生产力发展等核心领域形成的理论呼应，构成人民城市建设的学理基础。新形势下，人民城市建设以“人民至上”为根本价值锚点，在空间正义、民生保障、生态宜居三个维度构建价值准则，回应了城市化进程中人民群众的核心诉求。

空间正义是人民城市的基础价值，核心在于实现资源均衡配置。近年来，通过区域协调发展策略，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利用财政转移支付、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等机制，我们初步实现了新的历史时期的空间正义的实践建构。这种空间正义不仅体现在区域协调上，还贯穿于城市内部空间规划，通过优化公共空间布局、保障弱势群体空间权益、推进城市更新中的利益共享等，让城市空间真正成为全体市民共建共享的生活家园，而非资本积累的工具。

民生保障是人民城市的核心价值，关键在于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人民城市理念要求城市发展必须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城市经济学视

角看，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资源配置公平性的核心体现。通过相关政策统筹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资源，畅通社会流动渠道，破解城市化进程中的“半城镇化”等突出问题。在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各地注重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强化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切入点的作用，推进县镇村布局优化与协同发展，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硬联通”与“软衔接”，让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

生态宜居是人民城市的品质价值，目标在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城市的核心是人，宜居的生态环境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根本诉求。人民城市建设将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市工作各方面全过程，通过“推窗见绿、出门见景、林城相依”的高品质城乡共美生活圈建设，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待。在实践中，各地健全城乡一体的生态环保机制，推进城镇污水治理、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行动，构建林网、水网、路网“三网”融合的生态格局。这些设施的建设和改善不仅能够提高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还能推动内需进一步释放。消费型服务贸易的蓬勃发展是建设人民城市的重要动力源泉。

## 实践路径

在理论支撑与价值引领下，人民城市建设通过理念赋能、数字赋能、空间赋能三大实践路径，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发展新格局。

### 理念赋能——

当前，城镇化进入质效提升新阶段。建设人民城市需尊重“产与城”“人与地”“新与旧”的辩证关系，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穿规划、建设、治理全环节。

在规划层面，强化群众参与和监督，健全“省—市—县—乡—村”逐级

联动的规划机制，保障居民知情权与表达权；在建设层面，平衡保护与发展，既推动产业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又注重历史文脉传承与基础设施补齐；在治理层面，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构建政府、社会、市民多方参与的共治格局，实现政府治理与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同时，通过提升城市密度、温度、精度、广度与绿色度，以创造优良人居环境作为中心目标，让人民群众成为城市建设的主体与成果的共享者。比如，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过程中逐渐成为驱动城市发展的核心力量。从需求侧看，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消费需求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其带来的乘数效应将成为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消费型基础设施投资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又一新动力。与传统基础设施的建设不同，消费型基础设施涵盖文化、教育、健康、绿色空间等领域的公共服务设施。这些设施的建设和改善不仅能够提高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还能推动内需进一步释放。消费型服务贸易的蓬勃发展是建设人民城市的重要动力源泉。

### 数字赋能——

数字化技术为人民城市建设提供高效赋能工具。以“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为代表的数字治理实践，彰显技术服务民生的核心价值。

在服务温度上，关注弱势群体与突发事件，建立可替代操作体系，避免技术鸿沟；在服务尺度上，坚守公共治理导向，加强数据隐私保护与法治建设，避免技术至上与资本操控；在服务引领上，以长三角一体化等区域协调发展为契机，推动数字技术跨区域协同，构建数字产业集群与区域数据共享平台。

要通过数字化赋能，将重复性政务工作规范化、数字化，让工作人员

有更多精力开展人性关怀服务。同时，推动数字医疗、数字教育、数字乡村等配套服务体系向城乡延伸，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幸福感与获得感。

### 空间赋能——

城市发展遵循自身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空间赋能的核心在于实现“产与城”“人与地”“新与旧”的协同共生。

在“产与城”协同方面，坚持“以产兴城、以城促产”，破解部分城市“有城无产”或“产强城弱”的失衡问题，推动产业升级与城市功能完善深度融合，特别是依托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县域富民产业，增强县城对人口和产业的吸纳集聚效应。

在“新与旧”协调方面，摒弃重增量、轻存量的倾向，强化城市更新，保护历史文脉，平等保障新老市民权益，通过存量提质增效提升城市安全水平与群众获得感。

这种空间赋能路径，既体现了城市经济学对空间资源优化配置的追求，又践行了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的人文转向，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进一步看，从城乡融合到空间正义，从新质生产力培育到生态宜居建设，从数字赋能到共建共治共享，人民城市建设走出了一条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城市化模式，又符合中国国情的特色发展道路。下一步，要重视深化理论学理建构，结合地方实践细化路径举措，在破解“城市病”、促进共同富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持续彰显与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为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作者均为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首席专家）

“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学”融合创新研究

■ 刘晓红 林晖 裴学进

“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学”融合创新源于中国共产党早期新闻工作实践，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为分析框架，解构新闻传播活动的本质规律、权力结构与社会功能，并以中国新闻传播学实践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内涵。这种跨学科融合创新既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深厚的历史根基，也在数智技术变革中呈现出新的实践形态。

## 跨学科融合创新植根马克思主义实践性——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哲学，其唯物史观、认识论和自然辩证法为新闻传播学提供根本思维工具。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与新闻传播学的“实践性”特质深度契合。例如，唯物史观强调“存在决定意识”要求新闻传播学跳出“技术决定论”或“媒介中心论”，将新闻传播现象置于具体的社会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之中分析；唯物史观的“阶级分析方法”为解读新闻传播的意识形态属性、舆论场中的权力博弈提供了核心视角。

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人民性”与新闻学的“公共性”“群众性”内涵一致。“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理论品格，人民立场是我们新闻工作的出发点。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原则与新闻学的“公共性”追求高度契合，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事业的目标高度一致。马克思主义强调，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革命和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言人，核心是“为人民服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始终以“以人民为中心”为价值导向，强调新闻传播的群众路线、舆论引导的民生关切，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人民性”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具体体现。

马克思主义与新闻传播学的融合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诞生伊始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办了《向导》周报、《热血日报》和《中国青年》周刊等一批革命报刊，党的早期领导人利用报刊向工农群众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在艰苦卓绝的新闻实践中探索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党报理论体系。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标志无产阶级党报理论体系基本成熟，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奠定了实践与理论基础。无产阶级党报理论确立的党性原则、群众路线至今仍是指引新闻实践的基本方略。

## “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学”融合创新成果——

仅就学术研究融合创新而言，主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元元，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观、媒体融合、意识形态建设、国际传播能力等主题。

其中，“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是“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学”融合创新的主要学术议题，体现鲜明的政治导向和马克思主义学立场。

新闻史学研究聚焦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和实践的史学考证与阐释，强调回归经典、挖掘新材料，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经典作家的原典再溯源，力求更精准地理解其新闻思想的本源与精髓。

新闻理论研究聚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及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近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文献，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呈现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显示出该领域强大的学术生产力和研究活力。

在传播学研究领域，以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为理论根源，运用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劳动和资本理论、意识形态理论以及

异化、主体性等概念，分析人工智能、全球传播新秩序、媒介技术、符号消费等传播实践活动，涵盖“数字平台劳动过程与主体性”“数字媒介与技术批判”“技术政治与全球传播秩序”以及经典理论的当代再阐释。

## 数智时代跨学科融合创新推进路径——

数智技术重塑新闻传播生产逻辑、媒介形态与受众关系，传统马克思主义和新闻传播学的部分范畴面临解释力的挑战。如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上，吸收计算传播学、智能传播等新兴学科的理论成果，进而提升对传播实践的分析力、解释力？在算法主导的传播生态中，“流量至上”“娱乐至死”等现象冲击主流价值导向。如何通过技术治理、内容创新、制度设计，让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在数智时代落地生根？面对相关问题，有必要深入探索“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学”融合创新的推进路径。

第一，“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学”融合创新需避免“去意识形态化”“去政治化”倾向。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新闻传播学的立身之本。要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贯穿教学科研全过程，立足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把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的传播经验升华为学理成果，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概念与理论框架。

第二，强化多学科交叉对话，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新闻学、传播学、计算机科学、社会学等学科跨学科融合。研究方法上，应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推动“理论思辨”与“技术实证”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思辨与大数据分析、算法解码、社会网络分析等实证方法相结合应用。智能媒介带来的传播生态变革促使新闻传播学打破学科边界，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交叉，重构学科要素与机制结构，有助于提升应对复杂媒介现象的阐释能力。

第三，强化实践导向，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围绕主流媒体建设、意识形态安全、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等开展应用导向的跨学科研究，为政策制定、媒体改革提供理论支撑。新闻传播学人才培养和研究需建立学界与业界协同机制，围绕媒体融合、国际传播、网络空间治理等重大议题开展研究，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支撑。

比如，围绕主流媒体探索实践，深度融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通过党性原则引领、人民立场、辩证思维破局、系统观念统筹、改革创新驱动、服务大局赋能等视角，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

此外，还可进一步通过与主流媒体、科技企业开展合作，如参与主流媒体的算法优化项目，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导向融入算法设计；通过总结主流媒体的智能传播实践、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技术赋能的实践经验，将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成果，反哺跨学科理论体系建设。

总之，“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学”融合创新既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两门学科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数智时代的技术变革为这一融合进程带来了新机遇，也提出了亟待应对的新挑战。面向未来，唯有牢牢扎根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积极吸纳新兴学科的理论成果与研究方法，持续强化理论与实践应用的深度互动，才能推动跨学科融合向更高层次、更广领域迈进，进而为马克思主义与新闻传播学的时代创新，为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建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作者分别为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首席专家、首席专家）

# 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

“马克思主义+农业经济学”融合创新研究

# 推动理论范式革新与知识增长

■ 曹东勃 张锦华

“马克思主义+农业经济学”融合创新不仅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任务，而且是回应新时代农业农村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的必然要求。这一融合并非简单的理论嫁接，而是基于深刻的内在逻辑与共同的实践指向所进行的创造性建构。它要求我们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实质，并将其灵活运用观察、分析和解决中国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中，从而推动农业经济学理论的范式革新与知识增长，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实学理支撑。

## 夯实指导根基

马克思主义对农业农村经济的理论指导，首先体现在其提供了关于农业本质的哲学认知。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将农业置于人类社会发展基础性地位进行考察。“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这一经典论断深刻揭示了农业生产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第一需要的永恒意义。马克思主义认为，农业不仅是经济再生产过程，更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相交织的特殊领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土地作为最基本生产要素的分析，对农业生产中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关系的论述，为我们理解农业的生态属性、资源约束性以及可持续发展要求奠定了哲学基础。这种整体性、历史性的视角有助于克服单纯从市场或技术维度看待农业的局限，引导农业经济学研究更加关注农业生产关系的演化、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协调作用以及农业发展的长期规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一步提供了剖析农业领域生产关系的理论工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构建的剩余价值理论、地租理论等，为解构

农业中的剥削形式、产权关系与分配格局提供了关键钥匙。他对资本主义地租，包括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的深刻分析，揭示了土地所有权如何参与剩余价值分割，以及这对农业生产结构和阶级关系产生的深远影响。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细致考察小农经济的历史命运与转型路径，鲜明指出了对待小农的正确态度与方法。这些理论启示我们，研究农业经济问题必须深入到生产关系层面，关注不同群体在农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环节中的地位与利益关系。这对于分析当前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经营体系、农民增收等核心议题具有不可或缺的方法论价值。

马克思主义关于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的战略思想具有长远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刻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城乡对立的尖锐矛盾，并展望未来社会城乡融合发展的理想图景。“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指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方向。同时，马克思主义认为，城乡关系本质上是社会生产力与社会分工发展的结果，其演变受制于特定的生产方式。这一认识引导我们要历史地、辩证地看待城乡二元结构，认识到城乡发展不平衡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农业经济学研究不能就农村论农村，必须将农业农村发展置于国民经济整体循环和现代化全局中予以考量。

## 紧扣发展之需

“马克思主义+农业经济学”融合创新具有现实的必要性、时代的紧迫性。当前，农业农村发展进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阶段，面临的环境、条件、任务发生深刻变化。

实践发展呼唤理论创新。新阶段要解决的农业供给质量效益、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农民共同富裕、乡村社会治理等诸多问题，都是系统性、深层次

的课题，单纯依赖西方农业经济学理论或传统经验总结已难以提供全面有效的解释与指引。我们需要能够深刻把握中国国情农情、揭示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特殊规律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是其关于矛盾分析、群众路线、实践为先的思想，有助于抓住复杂现象背后的本质联系，立足于最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去思考政策设计与制度安排。

意识形态领域与学术话语权建设的要求日益凸显。农业经济学是一门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社会科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农业经济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必然要求，是构建中国特色农业经济学、摆脱对西方理论亦步亦趋状态的根本途径。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确保农业经济学研究始终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成果和学术话语，增强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对话能力与影响力。

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驱动融合创新走深走实。现代科学发展呈现出高度分化与交叉融合并存趋势。农业经济学涉及经济、社会、生态、技术等多重维度，需要综合性的分析框架。马克思主义以其宏大的理论视野和强大的整合能力，能够为农业经济学吸收多学科知识、实现理论创新提供有效的理论架构。将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法、宏观视野与农业经济学的实证方法、微观分析有机结合，有助于克服传统理论研究中的碎片化、表面化倾向，推动学科向着更加系统、深入、规范的方向发展，提升其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穿透力和预见性。

## 深化知行合一

### 深化基础性理论与经典文本的当代解读——

一要组织力量系统梳理、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业农

村农民问题的深刻论述，全面把握其蕴含的世界观、方法论和精神实质。

二要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涉农思想精华，结合我们党百余年来领导“三农”工作的丰富实践与理论创造，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变革，对经典理论进行时代化阐释与创造性发展。

三要着重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农业农村领域的具体体现，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农业农村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表现形式。

### 着力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经济学分析框架与概念体系——

这个框架应当立足于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能够系统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它需要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式，并充分吸收现代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等学科的有益方法。

要着力创造一批标识性概念，并给予其严谨的理论界定与学理论证，并围绕粮食安全、乡村产业、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农民增收等重大现实问题，形成一系列相互关联、逻辑自洽的核心理论命题，逐步构建起自主的知识体系。

### 健全促进融合创新的体制机制与人才培养模式——

通过设立专项课题、开辟理论专栏等方式，引导和支持跨学科研究团队围绕重大融合创新课题进行长期深耕。在农业经济类相关专业的核心课程体系中，应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块，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的教学。同时，注重引导师生阅读经典、掌握方法论、关注现实问题，培养一批既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又熟悉现代农业研究范式、既胸怀国之大者又扎根中国大地的青年学术后备力量，确保“马克思主义+农业经济学”融合创新落到实处、结出硕果。

（作者均为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首席专家）